



大国经济讲坛

2016

供需均衡、内外平衡 和大国发展

LARGE COUNTRIES' ECONOMY FORUM 2016: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 INTERNAL AND EXTERNAL
EQUILIBRIUM , AND LARGE COUNTRIES' DEVELOPMENT**

欧阳峤 帕金斯 方福前 盛斌 等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国经济讲坛

2016

供需均衡、内外平衡 和大国发展

LARGE COUNTRIES' ECONOMY FORUM 2016: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 INTERNAL AND EXTERNAL
EQUILIBRIUM , AND LARGE COUNTRIES' DEVELOPMENT

欧阳晓 帕金斯 方福前 盛斌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经济讲坛 (2016): 供需均衡、内外平衡和大国发展 / 欧阳峣、帕金斯、方福前、盛斌等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648 - 2918 - 6

I. ①大… II. ①欧… III. ①世界经济—经济发展—文集
IV. ①F113. 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2851 号

大国经济讲坛 (2016): 供需均衡、内外平衡和大国发展

DAGUO JINGJI JIANGTAN (2016): GONGXU JUNHENG、NEIWAI PINGHENG HE DAGUO FAZHAN
欧阳峣 帕金斯 方福前 盛斌 等著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雅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314 千字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2918 - 6

◇定价: 42.00 元

唐宋时期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代序）^①

欧阳峤

唐宋时期（618—1279）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由此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经济规模。这些规模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大国效应。

一、初始条件：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

从唐宋时期的初始状况看，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全国共有 9619254 户，52880488 人，进入唐代极盛时期。宋代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唐初正值战乱之后，人口急剧减少，而且逃散严重。《新唐书》记载：“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唐前期的统治者采取措施加快人口再生产。从贞观十三年（619）到天宝十四年（755），人口数由 13252894 增至 52919309，总增长率为 299%，每年平均增长率为 12% 左右。宋代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唐代开元、天宝之际，人口数量为 6000 万左右；宋代自宋仁宗时起，户口即超过 1200 万；宋徽宗年间户口超过 2000 万，每户以 5 口计算，人口超过 1 亿。二是区域大迁移。从 755 年的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长期的战乱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天宝元年（742），全国人口有 60% 生活在出产麦子和黍粟的黄河流域，其余 40% 则生活在南方；而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全国 10000 万左右的人口仅 38% 生活在北方，已有 62% 生活在出产稻谷的长江流域，南方的人口比例在宋代以后持续增长，使人口重心永久地转移到南方。唐宋时期的人口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推

①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动了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唐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唐太宗平四夷、安海内,征服和统治了广阔的疆域;唐高宗时期,中国的领土面积达到 1251.19 万平方公里。宋代的疆域变化较大,由于辽金割据,北宋的领土面积为 460 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辽国为 448.54 万平方公里;南宋的面积为 220 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金国为 530 万平方公里。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土地因素看,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唐六典·尚书户部》)宋代劳动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垦田面积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

二、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

唐宋时期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初始条件,从客观上促进了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从而形成唐宋时期庞大的经济规模。

唐宋时期的人口规模、国土规模与大运河的开拓共同推动了市场繁荣。其一,唐宋的水路运输发达,承接了隋代开凿大运河带来的便利,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得以连接贯通;唐代注重对大运河的整修疏浚,并进行运河交通的相关建设,形成便利的水路交通网络。同时,对全国道路进行大规模整修,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宋代极为重视水运,建立以汴京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进一步疏浚开凿广济河、金水河、蔡河、汴水、江南运河和长江。这个时期,出现了船户、挑夫和舵工等职业劳动者,他们把产品运转到全国各地,使各地互通有无。其二,唐代城市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开元时,全国设郡 328 个,县 1573 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大中城市出现规模扩张的趋势,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建成的唐长安城,面积达 84 平方公里,唐东都洛阳,周长约 282 公里;唐后期的扬州,周长在 17 公里以上;唐长安在籍在册的相对固定人口为 40 万~50 万,而流动人口数量不低于固定人口。宋代城市集聚更多的人口,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人口在 100 万以上,南宋临安人口也因“江商海贾”的汇集而在 100 万以上,武汉、建康、扬州、成都、长沙等城市人口均在 1 万至 10 万户。交通运输的发达促进人员和产品的流动,城市的繁荣也促进人口和商品的集聚,随后各类市场发达起来。唐代形成了以各级城市为枢纽的市场网络体系:第一层级是在全国具有中心或枢纽功能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第二层级是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的城市,如成

都、广州、幽州等；第三层级是可以辐射、吸纳周边市场的州县治所。在唐代后期，城市冲破了坊市制度，在农村的草市大量增加，各类专业市场逐步形成。宋代的区域市场发达起来，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梓州和兴元为中心的蜀川市场，以永兴、太原和秦州为中心的西北市场。

唐宋时期的人口规模、土地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唐代的农业生产规模庞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据《通典》记载，当时全国有耕地 620 万顷，以 1 唐亩合今 0.786 市亩和以每市亩产粮 154 斤计算，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750428 万斤；宋徽宗时垦田面积达到 1000 万顷，耕作技术进步和水利条件改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剩余粮食的增加，工商业迅速发展。唐前期的两河、山东地区丝织业发达，中唐以后，南方的丝织业突飞猛进，在江淮和西南地区占有显著地位；宋代的采掘业和冶炼业，从技术到规模都有极其显著的发展。采掘冶炼地区扩大，在产地集中的北方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铁产中心，如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河北东路邢、磁诸州铁冶、河东路诸冶等，不仅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而且规模庞大。宋代的造船业相当发达，有官营和民营两种类型，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高超的船匠。当时的漕船载重量大，可载乘 1.2 万石，海船可载 600 人左右。这样的大船，需要众多的工匠集体制造。唐宋时期产业规模的扩大，推动了经济总量的扩张。据估算，从公元 10 世纪末期到 14 世纪初期，中国的人均 GDP 水平超过欧洲，人口为欧洲的两倍，经济总量超过了欧洲各国总和的两倍。

三、大国效应：内需支撑和技术进步

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典型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进而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形成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内需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繁荣。

第一，大国依靠国内市场支撑产业的发展，实现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绘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大国型式：“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大国发展型式，依靠广大的国内市

场支撑产业发展，促进农业、纺织业、冶炼业、造船业、建筑业的发展，当时这些产业分工精细，有众多的工匠合作，从而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同时，这些产业具有相当庞大的规模，可以有效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繁荣。

第二，大国依靠人口众多和技术需求促进技术的进步，创造新的工艺和发明。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解释，当时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主要依赖于工匠、农夫的经验和思维敏捷的天才对自然的观察，中国因人口众多而拥有更多的能工巧匠、耕织能手和智慧过人的天才，因而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的假说，大国具有更大的技术市场，因而能够更好更有效地支持技术创新和发明，形成技术研发的优势。基于这两种原因，唐宋时期工农业技术取得重要进步。唐代发明先进的水车，江南的水利设施拥有灌溉、拒潮、排水等功能，水稻栽培已有移植法，并发明稻田除草工具；造船技术相当发达，并推动航海技术进步；冶炼行业创造金属切削工艺和磨制工艺，推广木风箱和灌钢法；唐代发明脚踏纺车，南宋发明水转大纺车，建筑技术、制瓷技术、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均得到发展。这些技术和发明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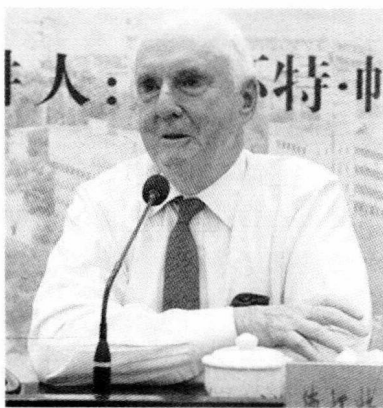
目 录

- 001 德怀特·帕金斯
后发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 012 欧阳晓 傅元海 王 松
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
- 034 方福前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
- 056 盛 斌 毛其淋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 年
- 083 陈昆亭 周 炎
富国之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致理论
- 105 李君华 欧阳晓
大国效应、交易成本和经济结构——国家贫富的一般均衡分析
- 130 张 兵 李翠莲
“金砖国家”通货膨胀周期的协调性——基于 SPSS 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视角
- 151 汤凌霄 欧阳晓 黄泽先
国际金融合作视野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 175 易先忠 晏维龙 李陈华
国内大市场与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来自电子消费品行业的新发现及其解释
- 199 高凌云 屈小博 贾 鹏
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异质性
- 231 钱学锋 黄云湖
中国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再估计：基于多国模型框架的分析
- 255 张亚斌 范子杰 冯 迪
中国 GDP 出口分解及贡献新测度

后发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①

德怀特·帕金斯



德怀特·帕金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资深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长期专注于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韩国、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是美国经济学权威专家，基辛格在 1971 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前，曾专程赴哈佛大学听取帕金斯等人的看法。帕金斯教授出版了 20 多本著作，并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等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 150 余篇。

^① 本文原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

摘要:一般地说,大国具有生产率较高和收入差距较大的特征,后发大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生产率高的优势和抑制收入差距大的劣势。中国要根据后发大国的国情,认真研究和吸取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维持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从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变到消费引领型模式。

关键词:后发大国;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中国战略

一、国家规模、生产率和收入分配

国家的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关关系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而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以人口数量衡量的国家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中对外贸易的份额呈反比例关系;随后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大小与其他变量也是相关的。除这些统计关系之外,还出现了种种猜测:为什么大国的规模可能导致更好或更坏的经济表现?一方面,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得益于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受到其规模的负面影响,管理这样庞大和民族多样的国家是困难的,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对经济政策和制度造成影响。本文主要关注效率和公平问题,如大国的增长速度比小国快吗?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规模大小造成的吗?

我们运用一些国家在1960—1982年间的经验,通过Slolow、Denison等提出的增长计算法框架,分析大国输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本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从总体上看,大国和特大国在1960—1982年间的发展速度比小国要快,但是那些发展速度飞快的是小国或中等大小的国家。在大型的经济体中,有一个内部平均数,可以掩盖各个地区之间的极端情况,而研究表明小国之间经济表现的差异高于大国之间的差异。第二,根据国家规模排名的发展速度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生产率提高的差异来解释,而不是投入速度之间的差异。虽然对于是否因为规模的原因成就了高速度的增长问题,还不可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上述数据提供了某些证据。在表1中,我们所采用的资本份额和人力份额采取了不同的假设,这些假设对收入份额进行调节,目的是顾及随着这些份额变化导致人均收入上升的情况。^①

^① 《发展经济学手册》,爱思唯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5页、第68页。

表1 按国家规模排序的生产率增长情况（剩余比重为年百分比）

国家	1960—1970		1970—1982	
	A	B	A	B
所有国家	2.7	2.3	1.2	0.7
特大国家	3.2	3.0	1.8	1.5
其他大国	3.5	3.1	1.5	1.0
小国	2.4	2.0	1.0	0.5
某些国家（按大小顺序）				
中国	1.2	0.2	1.4	0.1
印度	1.5	0.7	1.1	0.2
美国	2.3	2.3	1.0	1.0
印尼	2.8	2.5	4.3	3.6
巴西	1.9	1.6	3.3	2.9
日本	6.4	6.4	0.8	0.8
孟加拉	2.4	2.0	2.7	2.3
尼日利亚	3.6	3.2	1.1	0.4
巴基斯坦	4.7	3.9	3.3	2.7
墨西哥	4.4	4.1	2.4	2.1
德国	2.4	2.4	0.4	0.4
意大利	4.1	4.1	1.3	1.3
英国	1.7	1.7	0.6	0.6
法国	3.4	3.4	1.0	1.0

注：假定 A，资本边际产出是 0.12（12%）的常数，资本产出率和折旧率具有系统相关性；假定 B，资本产出率是 3.0 的常数，但是资本的边际产出的折旧率与收入具有系统相关性。根据假定 A 和假定 B，可以认为劳动产出的弹性随收入增加而增大。

在国家规模和收入差异之间，并没有单一的或主要的关系；虽然国家规模不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但还是有理由说规模确实影响到了这种差异的程度，主要是在收入方面大国比小国的地区差异更大。在表 2 中，可以看到国家规模和收入差异的关系。此外，国家规模也许可以成为解释中国农村收入差异大于韩国的部分原因。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两个国家位于顶端的 20% 人口获得了 40% 的总收入，而 40% 的底层人口仅获得 20% 的总收入。中国通过集体化消除了家庭之间的差异，但中国农村的地区差异似乎比韩国农村的地区差异大很多。同样的，国家规模也可以解释巴基斯坦的收入差异小

于印度的事实。^①

从大国的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特征看,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实行“扬长避短”的战略,充分发挥生产率较高的优势,有效抑制收入差距较大的劣势,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均衡,推动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表2 大国的收入分布

国家(年份)	占总收入的比例(%)		
	上层20%的人口	中层40%的人口	底层40%的人口
巴西(1972)	66.6	26.4	7.0
墨西哥(1977)	57.7	32.4	9.9
印度(1975—1976)	49.4	34.4	16.2
印度尼西亚(1976)	49.4	36.2	14.4
孟加拉(1976—1977)	46.9	36.0	17.1
法国(1975)	45.8	37.8	16.4
巴基斯坦(1964)	45.0	37.5	17.5
意大利(1977)	43.9	38.6	17.5
美国(1980)	39.9	42.9	17.2
英国(1979)	39.7	41.8	18.5
德国(1978)	38.5	40.1	20.4
日本(1979)	37.5	40.6	21.9

来源:《环球发展报告(1986)》,Chenery et al. (1974, pp. 8-9)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率就会减慢,有很多国家并没有持续发展到高收入阶段,反而在经历多年的高增长后,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中等性陷阱”,并在2007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了警示。在亚洲、拉美地区的大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家就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目前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些

^① 《发展经济学手册》,爱思唯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5页、第68页。

国家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有些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源自于自然资源的高价格，如石油、棕榈油和铜等。当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高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快；而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下降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减速。有的国家在经济上几乎全部依赖自然资源，如尼日利亚以及很多非洲国家和沙特阿拉伯国家；有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这个方面，如印度尼西亚。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的相关性不大，因为中国不是主要的自然资源出口国。

第二，有些国家的政治局势不稳定，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这些国家发生国内战争，政治局势动荡，影响国外和国内的投资者大胆投资。如缅甸持续的战争使得这个国家的经济难以增长，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就更具有破坏性。中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外敌入侵及国内战争也影响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战争将会获得更快的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是亚洲发展得很好的国家，后来，由于大规模的腐败和民粹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变得越来越落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三，有些国家采用不适当的发展战略，影响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有的国家主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而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消失之后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建立一流的教育和科研系统，仅仅依赖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难以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到高收入阶段。在增长战略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大失误，就是一些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中国在1978年以前采用苏联式的封闭发展模式，就是很极端的事例；而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的过程中则是没有选择地采用了“进口替代”模式，也不利于出口。

第四，有些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也可能导致经济的停滞或者衰退。比如，汇率估值过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问题；有的国家由于政治介入和寻租的原因，过分地依赖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产生低效率；此外，如果不能及时地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改善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也将对中等收入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部分在拉美。由于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出现掠夺性政府、高通货膨胀，没法实现从“进口替代”产业向出口产业的转变。然而，东亚和东南

亚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却都发展成了高等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和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能否进入高收入阶段，还需拭目以待。从东亚经济中已经成功地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1. 由于缺乏自然资源的原因，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得不依靠发展制造业和加工品出口，而不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
2. 由于它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所以有足够的合格的人力资源，可以满足现代生产和服务业的需要，并且可以同高收入国家竞争。
3. 这些国家具有政治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收国外投资，其中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非常依赖国外直接投资。
4. 由于建立和健全市场机制，主要依赖民营经济，经济发展具有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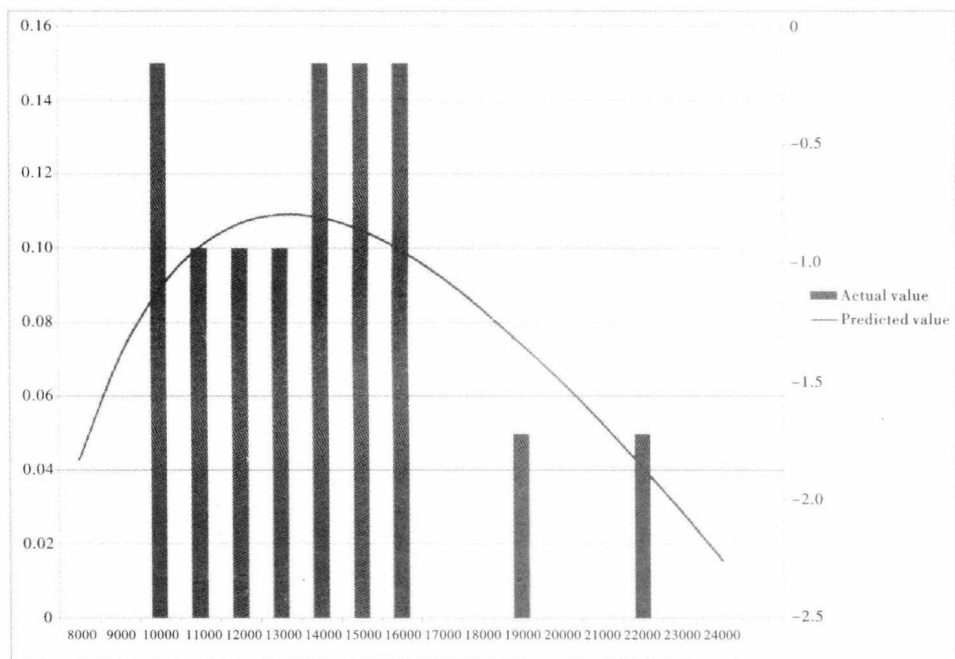


图1 GDP增长放缓的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

在图1和表3中，我们统计了GDP增长放缓的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GDP增长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在从中

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增长速度达到 6% ~ 7% ; 在这些高收入国家中,没有一个人均 GDP 增长率超过 2%。如果我们把开始时间从 1985 年推移到 1990 年,它们的人均 GDP 都下降到 3%。其中有两个属于城市经济体,由于没有较大的农业部门,所以比其他国家发展要快。

表 3 高收入经济体的 GDP 增长 (1985—2015)

Countries and Regions	GDP		GDP Per Capita
	annual growth rates		Per Capita GDP (2010 US\$)
OECD members	2.3	1.5	37368
Euro area	1.8	1.5	38341
European Union	1.9	1.7	34861
France	1.8	1.3	41330
Germany	1.8	1.6	45270
Hong Kong SAR, China	4.4	3.4	36117
Japan	1.6	1.4	44657
Rep Korea	5.9	5.1	25023
Italy	1	0.8	33705
Singapore	6.4	3.9	51855
Spain	2.4	1.7	30588
United States	2	1.6	51486
United Kingdom	2.3	1.8	40933

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成为高收入阶段的时候,发展的速度会放缓?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有些具有可测性,有些则没有可测性:可测的因素,包括农村的人口红利,制造业在 GDP 中的份额增加和随后的回落并逐渐被服务业取代,而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低于制造业;不可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发展的速度将会下降,而且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所以,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国家能否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或模式,及其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能否有效地驾驭这种模式,具体的政策是否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及所在的发展阶段。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路径

国家规模可以影响经济增长, 大国具有增长率较高和收入差距较大的特点。因此, 后发大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 既要利用好大国经济增长率较高的优势,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又要抑制大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劣势, 努力改善国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前面分析了一些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原因, 中国应该认真思考这些因素, 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首先, 在中国的经济变得日益复杂的条件下, 其体系能否有效地维持一个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中国以前发展的原因, 然后再分析中国的改革能否使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支持 GDP 增长率 6% 左右的速度。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左右的高生产率增长, 主要是因为计划体制的瓦解, 然后, 这个过程要比在商业社会中设计和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平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或者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显得容易一些。因此, 与摒弃计划经济体制相比, 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重要。从表 4 可以看到, 这些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地下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4.7%, 下降到 2012 年的 1.0%, 而增长率则主要来自高投资率以及由此产生的高资本存量增长率。从表 5 的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看出, 从 1979 到 2014 年仅有微略的上升。人们普遍认为, 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并不适合维持高增长速度, 因为投资的效率下降很快, 其原因是由于以前的投资弥补了发展的空档, 满足了发展的需要, 比如交通和住房建设, 这些东西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忽略了, 需要加大投资来发展, 而现在的中国已经建成了一流的交通系统和住房体系。

表 4 中国供给源要素的增长

Period	增长率 (%)					对增长的贡献率 (%)		
	GDP	固定资本	初级劳动者	受过教育的劳动者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	受过教育的劳动者	全要素生产率
1953—1957	6.5	1.9	1.2	1.7	4.7	12.7	14.9	72.4
1958—1978	3.9	6.7	2	2.7	-0.5	73.7	39.7	-13.4
1978—2005	9.5	9.6	1.9	2.7	3.8	43.7	16.2	40.1
2006—2011	11	15.2	0.4	2.1	3.3	59.4	10.9	29.7
2012—2014	7.6	12.6	0.4	2.1	1	71.3	15.8	12.9